

导 论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学术史的一次探索，目的是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种视角：它的起源、演变、发展和现状。回顾它一开始是什么模样？创立者是谁？导致连续性和变化性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永恒和一致的思想呢？谁是写出这些不朽名著的解读者？

任何领域或学科，每一阶段提出的问题以及提出问题的方法都是该阶段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的标志。它们有助于我们划分该学科发展的历程，解释它是如何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立场对立的代表人物之间经常进行的“大辩论”在解释各种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下面篇章里，我们着手收集了经验和逻辑方面的证据来描述和评价重要的思想流派。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观察家和学者们问道，国际关系研究是不是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它有始终不变的核心吗？它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增进知识的学科的基础上？它解决了某些基本的、反复出现的定义性问题吗？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这么一个核心，政治学也有这么一个核心。弗里德里克·邓恩（Frederick Dunn）从耶鲁迁往普林斯顿那群倒戈者的领头人，认为国际关系应该研究二十多个不同学科。昆西·赖特在他的不朽名著《战争研究》中寻求与从农业到动物学领域专家的合作。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涉及从社会道德沦丧到惧外等社会发展趋势。国际关系涉及的主题领域宽，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但很少有人将其称为一门学科。

后来，赖特和其他人继续探讨对立的定义和统一的主题。他们把社团和社会作为尽可能统一的概念加以研究，并把技术和工

业作为这个领域的决定因素。技术革新对该领域的范围和内容的影
响是什么？因此，现代化的进程要考虑，要考虑它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变革性影响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运动成为研究的主题。对它们的研究要求在哪些方面重新规范主题？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当学者们转向国际政治并把它作为中心点时，统一的主题才开始出现。

每一种学科都存在着这么一种倾向，认为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对于基础科学和技术，证据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证实和支持这个观点。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证据的说服力要逊色得多。显然需要产生一些新的方法论和范式的变化，灵活多变的开拓者根据需求提出新的方法论和范式，但这些变化所取得的成就参半。全新的概念和方法都会有出头之日。但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其他的概念和方法又取而代之。因此，评价新知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去粗取精，从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永恒知识遗产里筛选出精华来。

当前这项研究的起点是研究位于芝加哥、耶鲁和哈佛的最早的三个思想流派。尽管有些人不同意这种分法，但他们同时也赞成，挑选 20 世纪 40 年代主要的研究机构要比在 90 年代做同样的事容易得多。芝加哥、耶鲁和哈佛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三所大学所承担的科研任务、所拥有的开拓型思想家和所具有的综合实力。它们的实力远不止反映在其科研机构取得的成就和影响上。每一所大学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芝加哥大学由于拥有两位学术巨人——汉斯·摩根索和昆西·赖特而尤其兴盛。这三大学派的影响在二战后扩大，甚至在领导地位受到质疑后，其影响力仍然存在。（芝加哥大学的领袖人物去了其他的研究机构，摩根索去了纽约城市大学，昆西·赖特去了弗吉尼亚大学，他们到那里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哈佛虽有一批很有天赋的教授，但在这个领域没有人能够与摩根索和赖特的权威相提并论。哈佛的实力体现在它的名字、

引人注目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学生上。耶鲁招募的挑大梁的学者要比芝加哥多，但在当时声望要小一些。后来整个耶鲁的国际关系学者，除了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都迁往普林斯顿。

把这样三大科研基地的特征称之为“思想流派”的做法在欧洲要比在美国普遍些。在欧洲，多年来，不断听到有人提到海德堡学派（Heidelberg School）、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等，其中，个人等同于研究中心和思想流派。有些人就是某一具体方法的创立者。美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但把研究机构等同于主要负责人和方法。因此，在探讨国际关系学术成就和教学的起源时，把摩根索和赖特划归为芝加哥学派，把强调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划归为哈佛学派是极恰当的。这样做不至于使人们把美国大学的体系和欧洲的混淆。美国这三所研究机构在国际关系领域都留下了与众不同的方法和启发性的理论，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他们教授的大学的学术氛围里获得一种力量。对于芝加哥大学，摩根索／赖特时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美国军人从世界各地退役回国，这一时期进入非常成熟期，其学术狂热是几代人再也难以看到的。成熟的学生和知名教授之间对话的频繁前所未有，让人难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开始，国际关系注目的焦点转向了规范性问题，学者们把注意力从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转向国际道义或伦理。过去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过国际道义，但那只是论及国际法和机制时涉及过。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摩根索，毕生都始终关注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的关系。30—50 年代的大部分著作把道义等同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发展。国际法专家和学者常常写道：国际主义高尚，民族主义恶劣。责任意识和负罪意识共同促动这种思想。美国人过去无视国际联盟，现在却进行一场国际主义者的十字军运动以确保历史不再重演。没几个人愿

意费脑筋去思考如共产国际这样的“不良”国际主义的例子和采用代议制政府形式的高尚民族主义的例子。

重新考虑规范性问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几个顶尖级的人物，他们知道世界政治的严酷本质及国际道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群人中最重要的是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讨论他。他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主持政治道义的讨论直到去世，赢得了宗教思想家和世俗思想家的尊重。在一次他和李普曼都参加的会后，有人听到李普曼私下问道：“要过几代我们才能再看见像他那样的人物出现呢？”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从知识界到政界和商界，没有人能够无视尼布尔。他重新开启了 30 年代以来已经衰落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他参加政治科学家和国际主义者的会议，完全是靠他的智慧和个人能力赢得尊重。尼布尔不是惟一走在这些人前列的思想家，但他是最令人难忘的人，没有人能够忘记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要是忽视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专家和外交家那就错了，因为他们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起来。事实确实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迹象：美国正在进入知识分子和学者超越学术的范围以获得对伦理和外交政策新见解的时代。其中，做出贡献的两个人——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最近都写了回忆录。凯南把他早期的和范围更大的回忆内容写成两卷《回忆录》。其中关于他早期回忆的一卷题为《世纪末的反思：1982—1995》（*At a Century's Ending: 1982—1995*）另外一卷是《迂回：个人的政治哲学》（*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后一卷突出的特点是它尤其强调政治哲学和伦理及外交政策，也包括凯南对于人性的思考。凯南的继任者、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保罗·尼采自己写过一本学术自传——《紧张对峙》（*Tension Between Opposites*），该书部分是根据他在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组织政治理论课程时的经验。笔者在科学与政治、

人与人性、伦理与对外政策的论题下分析他们的著作，力图评价这两位外交家所做的贡献。在一些领域，他俩的观点一致，在其他领域如科学与政治、对于人性的看法，他俩观点向左。但在伦理学方面，最显著的分歧是尼布尔和这两位外交家之间的分歧，这一点清晰地表明，实践者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

第三部分论述的是各种突出问题，它们代表着影响人们态度、方向和哲学信念的不同观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普遍态度是什么？它们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比如：乐观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就十分重要，候选人成败的差别常常在于此。然而，现实主义在国内国际政治中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两种态度如何联系起来，难道它们永远是相对立的吗？有什么人是一向乐观或者一向现实的吗？这两种态度的优点和弱点在哪儿？其中一种态度用何种方式可以平衡另一种的不足？如果它们事实上是一对对立物，那么它们有时是不是可以相互加强呢？尽管评论家和演讲者常常使用“乐观主义”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对它和其他态度进行其应有的严肃分析。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这两者各自代表着一种特别的职业态度或姿态，那么，如何缩小——即使不能消除——它们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理论家和实践家注定要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吗？他们可以统一起来吗？笔者这一生体验过这两种生活态度——在学术界做了 10 年的研究生和教员，在一家大的基金会做了将近 20 年的官员，指导广泛的国际计划，最后，在一所很受人仰慕的大学的公共事务中心做了 20 年的教授和主任。在每一个岗位上，笔者都感受到两种职业态度的紧张对立。由于笔者既坚持理论又坚持实践，所以在两个领域都不十分精通。对于实践者指责说理论工作不重要，“只是动动嘴而已”，笔者已耳熟能详。在大学，笔者常常感受到学者嘲笑行政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由于笔者关注到理论和实践都

有专业变样的危险，所以笔者一直相信，两者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乃是一种缩小分歧的手段。理论家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完全脱离实践就会深受自我放纵的空想之害。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只知道看不起理论家，却忘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话：在每一个政策动议的背后都有某个“学术文人”的杰作。

最后，武力与和平也常常被看作一对对立物；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少认识到它们在现实主义方面的必然联系。问题还是：是否我们承认这对立的两者最终要相遇和共存。冷战期间，潜在的武力威慑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以实力求和平”成为美苏政策的口号。有句古老的军事格言说：“战士不可能让刺刀生锈”，这句话表明以武力求和平有时会导致冲突。剑出鞘，枪上膛，随时都可能打起来。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对立物像其他对立物一样就走到了一起。武力与和平都是战略整体的一部分。政治现实主义创造了这个联合体组织：“我们必须以实力来谈判”。

讨论了乐观主义、实践与和平之后，本书的注意力转而考察新世界秩序研究。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恢复了美国人的新世界秩序观，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观念。从他宣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来，进步的迹象很小。然而在全球危机地点如波斯尼亚、古巴、海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朝鲜、中国台湾，很显然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秩序。但真正的进步充其量仍然受到阻滞。1992年的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各国携手作战捍卫共同目的的景象似乎指明了通往变化之路。如果观察家记得国际社会定位在以国家为中心，那么围绕着建立新秩序的欢快心情应该有所节制。首先，联合国虽然被赞誉为迈向新的世界秩序的一大进步，但它仍然受制于成员国的意志。其次，领导人的哲学和政治倾向推动着建立新的世界所取得的进展。当时的美国总统、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宣布世界秩序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伍德罗·威尔逊是以联盟维护和平的倡议者。吉米·卡特为人权而捍卫新的

世界秩序。他们的热情偏离了现实，但是他们的方向即使没有影响到短期的国家政策，从长远来看也明显影响了民意。这个历程仍然漫长而又困难重重。政策宣言和国家实际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仍然没有缩小。而且，学术分析和政策制定所作出的设想和结论迥然有异。

最后，我们论及政治哲学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在冷战早期，赫茨 (John H. Herz) 对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赫茨问道，如何根据自由主义的信条来证明现实主义的严酷性呢。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 (E. H. Carr) 在他的著作《20 年危机》中，对传统的思维提出质疑，并继而分析了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及“和平的条件”。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作者有决心探讨当代两种颇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和现实主义思想学派的相互关系。尤其在尼布尔后期的著作中，他设法解决的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关系。第三部分也提供了重新了解政治哲学中以伦理为题提出的问题的学术背景。这些问题关心的是以目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哲学如何与以手段形式存在的现实政治相互作用。支持对现实主义的这种镜像分析和某些政治哲学是巴特菲尔德爵士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约翰·考特尼·默里 (John Courtney Murray) 和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做出的贡献。

第四部分集中阐述了主要的思想流派中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一点上验证思想家概括的系统思想，并把系统思想与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尤其是肯尼思·沃尔兹 (Kenneth Waltz) 的著作所阐述的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传统主义者注重结构，新现实主义者注重体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比做四幕剧，每一幕都采用大辩论的形式。第一次大辩论发生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展开。参战的两位主角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坦能鲍姆 (Frank Tannen-

baum)，另一位是汉斯·摩根索。前者把这场大辩论看做美国例外论之中的冲突——美国例外论认为我们美国在民族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后者被妖魔化为美国邪恶的均势原则之父。第二次辩论是传统方法和科学方法之间的辩论，支持科学方法的一派坚持精确分析和可预测性的前景，而传统的思想家则皈依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强调美德和智慧。第三次辩论的一方认为世界日益相互依赖，另一方坚持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接下来是第四次辩论，一方支持体系理论，另一方是传统学派，前者力图进行更严格和更系统的分析。造成各个思想流派分野的问题仍未解决。最后一次辩论的两派之间观点都是现实主义，但所使用的概念和体系却大相径庭。

在结论中，我们的讨论回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及政府和国际关系中日益增多的怀疑主义。幻想的破灭和不信任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顽疾。在这个广泛的论题下，我们寻求有助于了解和可能克服公众对政治家和公共事务的不信任的教训。水门事件、电视、联合国都曾造成幻想破灭阴影的扩散。我们寻找出路，或许更现实地理解人类本身及世界本来的面目有助于指明前进的道路。没有什么能比人类生存这样与性命攸关的大事更加前途未卜了。

第一部分

思想流派

在欧洲，根据有名的派别——法兰克福学派、海德堡学派、科隆学派、慕尼黑学派确认研究领域很平常。但这种确认形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高等教育格格不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大学的地位由某些重要领域所体现，它们地位突出是因为有美国的、有时有欧洲的重要思想家在那里从事教学并发挥领导思想潮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天主教理想主义等同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即等同于他的政治和规范思想而不等同他本人教过的学院（纽约联合神学院）。我们的方法可能有一些优点。这些方法可能是美国人思想中个人至上的例证。

但近年来，为了推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一些观察家要求注意这个事实，即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建设中，某些学院和大学已经产生了与自身不对称的影响。也就是说，某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在一定的科学领域或学术努力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如加强师资力量、组建研究队伍、建立大的图书馆，以及传递他们的机构正在研究的知识和证据。

本部分的重点是创造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三个思想流派和研究机构：芝加哥学派、耶鲁／普林斯顿学派和哈佛学派。讨论这三个学派的原因对于研究或正在研究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为了揭示这个研究领域的起源，你必须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和 50 年代。这几十年的重要

意义对一些人来说不那么明显，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次研究或许有助于了解最近的一段时期——70 和 80 年代。出于这个原因，寻求国际关系研究的起源并在这个过程中力图将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人物恰当定位很值得。如在 20 世纪 40—60 年代的芝加哥大学，昆西·赖特和汉斯·摩根索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一流学者。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耶鲁大学实行了一次强大的招贤计划，努力与芝加哥和哈佛相抗衡。事实上，耶鲁的重要人物都来自于芝加哥等处，虽然这些人最后几乎都去了普林斯顿，但仍然在耶鲁建立起了有影响力的重大研究项目。在哈佛，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爱默生（Rupert Emerson）和较年轻的学者们是提出以政治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问题方法的开拓者。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的项目值得研究，因为国际关系研究过程中的主要方法论植根于对美国政府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对美国政府的某些新颖分析法是查尔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的研究范围。他于 1900 年来到本系，1923 年当上系主任，1940 年，他放弃了系主任的头衔（尽管他仍有实权）。梅里安坚持认为美国政府的研究必须以政治学的研究为基础，他对实践者讲授的政治学不少于对理论家讲授的政治学。他积极参加产生实证成果或者服务于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及政府人士的成果的项目。“首长”的项目（人们称他为“首长”）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思想家在从事芝加哥公共管理和市政研究过程中的创造。他在全中国也很活跃，比如积极参加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组建。他被描绘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事业创办人”^①。他和同事及朋友们密切合作建立了“1313”——“公共管理票据交换所”，把许多州和地方的公共管理项目汇集在一起。他也是最终促成国家公共行政学院建立的倡议者之一。他对全体同仁所做的发展行政领域的研究感兴趣，这些人包括学术上的同事像列昂纳多·怀特（Leonard White）和里夫斯（Floyd Reeves），也包括政府顾问及组织规划者像布朗洛（Louis Brownlow）和埃默里赫（Herbert Emmerich）。他把在现实世界中实践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至少有限地参与了

^① Mark C. Smith, *Social Science in the Crucible: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Objectivity and Purpose, 1918—1941* (Durham, 1944), p. 84.

芝加哥政治。他是第五行政区的市政委员会委员，他竞选芝加哥市市长但是仅以微弱之差失败了，有人说他的竞选对手窃取了选举。

同事们称梅里安“首长”是因为他的负责能力，这个绰号再恰当不过了。他似乎有能力吸引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兴趣的人，经常还并不费力。1923—1940年他当主席期间，负责招募了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包括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舒曼（Frederick Schuman）、莱特斯（Nathan Leites）、列昂纳多·怀特和昆西·赖特，他们都是从别的研究机构来到芝加哥，共同组成了“梅里安王朝”，并在怀特和他精心挑选的继任者普利切特（Herman Pritchett）的主持下保持了生机活力。他们对梅里安的工作感兴趣是因为受到了他认为脱离政治学的行政管理研究不大可能有所收获这一观念影响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里安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了怀特，而后者竟把行政管理看成是脱离政治学的东西。拉斯韦尔写了一本书，把政治学定义为“谁在何时、何地得到何物”。该书书名目的是为了使人思考：即使是在官僚体制内，政治学仍然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一个方面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特殊的利益正在兴起。

梅里安很早就提出了集团政治的某些理论。他写有一本书，书名是《政治学新论》（*New Aspects of Politics*）。尽管他反对任何集团利益基础上的政治理论，但他还是论及了政治党派和政党联盟政治。新兴的势力正在出现。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梅里安对新的政治力量仍饶有兴趣，没有把它们排除在自己思考的范围之外。他把政治精神病理学交给了拉斯韦尔，把一种全方位的数学方法留给了戈斯内尔。对他来讲，“政治学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如战争、革命、阶级和种族冲突这样的无谓活动。对于这些‘不适当的社会调整’应该在技术层面加以消除……在梅里安充

满信心的世界里，‘未来是一个社会工程问题，’^①

梅里安身体力行，推动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和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参与政治（道格拉斯当上了参议员，斯蒂文森当上了州长）。他们的活动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注意，支持他们的人中有的和芝加哥大学联系甚少，但也有一些人是该校全职教师。道格拉斯是经济学教师。他教授经济学原理，有时向饥饿的消费者（学生们）分发橘子，当他们吃橘子时，向他们阐述利润递减法则。斯蒂文森却不那样授课，他是位知识分子，不是位演员。其他的处于芝加哥学派边缘的人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大家记忆中，未来的市长、第五区市政委员会委员戴利（Richard Daley）特别突出。我们研究生能够说服市长和其他的政治人物参加大学里的项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与梅里安的关系。

梅里安对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研究的兴趣反映了他对制度的兴趣。美国怎样管理自己？总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1937年，行政管理委员会公布了题名为《总统需要帮助》的报告。这个题目来自于梅里安和他的同事们对向总统提供制度支持的兴趣。他们推荐成立预算局和其他的行政办公机构，希望它们发挥协助总统和协调各方面的功能。他们呼吁有必要建立白宫办公厅直接服务于总统。这一点的前提是许多任务被分配到其他政府部门。

这就是梅里安：推动的力量，决断的中心，行动的先锋，一位予人深刻印象的人物。他高大魁梧，留着一头蓬松的头发。他丰富多彩的个性不仅对老师而且对学生都有吸引力。多年来，他每星期三的晚上举行专题讨论会，要求所有的研究生参加。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出现在战后的舞台上，梅里安就已经退休了，因此任何与芝加哥学派有关的历史必须从对该学派做贡献的人谈起，即使他甚至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梅里安去世后，他的

^① Mark C. Smith, *Social Science in the Crucible: 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Objectivity and Purpose, 1918—1941*(Durham, 1944), p. 88.

儿子罗伯特在一些有限方面继续从事他的工作。小梅里安感兴趣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国会和政治过程，而不直接是国际关系。尽管他的确参加了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的会议，但与其说他是位学者，不如说他是位实践家。相比之下，一些来到芝加哥、后来又去了别处的学者真正感兴趣的是国际关系的现实。

前面提过拉斯韦尔，是他引入了对法律和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当他去了耶鲁之后，但甚至在芝加哥大学时他已经引入了对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上的力量的研究及它们对法律的影响。他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知识。以任何标准衡量他都不同凡响。硕士学位考试结束后，他被请出了会议室，然后评委会商议他的去留问题。传闻说，评委会主席怀特建议委员昆西·赖特说：“各位，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让拉斯韦尔先生通过，而在于如何阻止他回来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捉弄我们大家。”

拉斯韦尔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算低，即使他所在的芝加哥学派的继任者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采取一种与他不同的态度。他积极参与美国社会活动。他是大部分职业联合会的主席。他是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关于专业发展方向争论的焦点人物。他是个唱反调者，但有意志、有能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感到有必要建立政治研究更科学的精确性。别人对这种方法持保留态度，但拉斯韦尔毫不妥协，声称科学和心理学是政治学发展的最大希望。将来政治学的研究是变为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观点的集合。

莱特斯是拉斯韦尔的挚友和门徒。他对共产党国家感兴趣，写过政治局的运行模式。这个运行模式是个程序，共产党政权根据这个程序获得、保持权力，进行统治和利用共产党的作用。还有一些人：一些比较年轻，几个是其他系的。约翰逊（Walter Johnson）是美国历史学家，对美国政治有浓厚的兴趣。约翰逊是斯蒂文森的传记作家，梅里安的朋友和门生，喜爱实干。每当梅里安演讲或在什么地方抛头露面时，他总会伴随其左右。他收集关于政治家、格言和轶事的著作。他和其他人把梅里安看成行为

榜样和鼓舞他们前进的人。人们可以在芝加哥政治思想的整个范围内追寻梅里安的影响。

梅里安和他的朋友在芝加哥学派国际关系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影响到了国际关系研究项目的领导层。梅里安、约翰逊和拉斯韦尔尤其支持并影响了国际关系的精英探索新的、重要的理论。比如，在读昆西·赖特的《战争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时，你会发现别人灌输的思想，昆西·赖特和他的同事们后来把它们作为研究的课题。

芝加哥学派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创始人是昆西·赖特。在他的一生中，他不断地就国际关系项目进行写作和思考。1931年他来到芝加哥，当时他四十刚出头，立即投入国际法的教学工作。这种课有两门，一学期上国际和平法，一学期上国际战争法。这两门课在芝加哥很有名，以个案方法研究国际法。赖特无所不包的兴趣，推动着他去探寻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方法，而拉斯韦尔总是可以提出一些新颖的观念和新的方法。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对国际关系的芝加哥学派感兴趣。作为补充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拉斯韦尔和其他人热衷于新概念、新方法，但芝加哥学派与耶鲁相比从没有偏离他们对制度、历史和过程的主要兴趣太远。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史是值得赖特关注的一个主题。阿尔佩兰（Willian Halperin）、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和来自欧洲的避难学者，都属于芝加哥国际关系学派，他们对该学派的影响始终存在。

经济学家中对国际关系研究感兴趣的有梅策勒（Lloyd Metzler）、奥瑟利茨（Bert Hoselitz）和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奥瑟利茨是发展经济学的权威，他创办了一份发展研究方面的独特刊物，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做较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完善了国际关系学的这一部分。把经济学放进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课程中的做法被证明很笨拙。经济学家认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包括经济学理论），懂得这个

领域，能说个一二。尽管学生们认识到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十分重要，可以弥补他们的不足之处，但这些要求常常使许多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课程望而却步。一旦某个项目的要求和芝加哥的一样十分苛刻，就很难将其他学科的课程放进这个项目。其核心科目是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史和国际社会学。

昆西·赖特相信这种项目提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最佳框架。他也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一个国际关系跨学科委员会。通常意义上，它不是一门学科。它没有提供像经济学或政府管理那样对单一学科的深度研究。但它很快成为重要的、积极的、有影响的项目。它为学生提供了在国际关系的广泛领域学习 9 门或 10 门必修课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学生们选择的是一个专业化领域。由于接受过这个项目的深入广泛训练，战后这个委员会的最早一批学生几乎在 50—60 年代都得到政界、商界和银行界的任命。这是训练国际关系学生的一种努力，而不是简单地在现有的政治学课程中增加国际法、国际关系史或其他什么学科。

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治学系也给学生到自己系外选课以相当大的灵活性。比如，笔者本人修过美国早期与中期史作为所谓感兴趣的相关领域，以补充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笔者本人一直很高兴自己学习了历史。由于笔者本人提前做的准备，使自己可以很快找到历史事件、制度、参与政治史和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领导人。换言之，本人能够较好地理解林肯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因为本人理解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同样，也适用于本人对于威尔逊在一战期间及战争后领导作用的理解。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由于有历史作为基础而大大加强了。

所有这些由于交叉学科学习得到国际关系委员会和政治学系的鼓励而很有效。对委员会和系的课程要求不一样，影响也不一样。有人认为，在政府管理系国际关系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宪法、政党、公共行政、政治理论等方面应该知道得多一些，这样可以为从事教学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人认为，国

际关系委员会对于研究其他相关领域的类似强调应该受到鼓励。

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的黄金时期开始于摩根索的到来。不仅是由于摩根索所做出的贡献，而且也由于他作为国际政治学的创始人与芝加哥国际法创始人昆西·赖特之间曾经有过创造性的相互影响。

40年代中期，服兵役回来的研究生大部分不知道摩根索。相对来说他默默无闻。他在布鲁克林学院和堪萨斯城市大学教过书。他来到美国没有任何熟人或工作。大部分避难的欧洲学者在抵达美国本土之前，就有朋友出来等他们。摩根索认识美国大学界的一个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讲道：爬上洛图书馆（Low Library）长长的台阶，乘电梯去了教授的办公室；出来开门的人摇摇头说，那位朋友已经死去一年多了。他惟一可能的熟人不在人间了。和大部分避难的德国学者相比，摩根索是孑然一人。

后来，摩根索去芝加哥顶替赖特，当时赖特在做纽伦堡审判工作。对于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赖特的公共服务有某种神秘的色彩。我们芝加哥学派的大部分人常常主动靠近他。赖特受到学生顾问、研究与教学助理和试卷打分者的坚定支持——所有这些人的活动决定着研究生的任命和经济资助。笔者来到芝加哥大学不久就当上了赖特的学生助教。笔者的任务是给论文打分和替他监考，帮他整理他文章和书籍所需要的研究材料。

由于赖特一直在参与华盛顿政策制定的过程，他激起了我们大多数来到芝加哥学生的兴趣。他是纽伦堡审判中罗伯特·杰克逊法官的顾问。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让年轻的、可塑性很强的研究生们激动不已，他们很喜欢接触明显接近审判现场的人。他在很多方面彬彬有礼、慷慨大方。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他最优秀的学生参加如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甚至芝加哥联合国协会这样的项目，后者是在他与其妻子的帮助下建立的。学生的参与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实践的气氛。赖特夫妇不仅仅是“图书馆里的读